



留痕集

LIU HEN JI · LIU HEN JI

大旗永不倒 / 相约东篱下
南岭之光 / 太阳的使者
铁塔顶上的人 / 儿女情
皇帝与门官 / 余赛花

李小猫著

四庫全書

李小猫 著

星 河 文 丛

留 痕 集

LIU HEN JI · LIU HEN JI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痕集/李小猫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

(星河文丛/童岭主编)

ISBN 7—5059—3618—2

I. 留…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816 号

书名	留痕集 (星河文丛 共 8 册)
作者	李小猫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胡玉兰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刷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8 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00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5059—3618—2/I. 2772
全套定价	106.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生存的本能(自序)

1980年的初秋，我接到晋东南地区文化局的一封信，让我到长治市印刷厂校对我的剧本《余杨缘》，这条激动人心的消息差点让我跳起来。我对正在哺乳的妻子兴奋地喊道：发表了这个剧本，以后就是死了也无悔！

此前，1972年的《上党文艺》曾表过我的一个小戏《送猪记》，但，那是爸爸手把手教的，版权应该归他。尽管此后我已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但从宏观说，包括我都是他的“版权”。因为，省、市文艺界老一辈的领导和同行们介绍我时总是这样说：这是李近义的孩子。

1994年初，长影来人在晋东南挑选一部拍电影的戏曲剧本，历时一月，遍选名家未果。就在长影来人准备打道回府之际，我这个无名小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上了自己的《余杨缘》，不料居然中选。此后，直至《余杨缘》易名《余赛花》被拍成电影公开上映、受奖，我都冷静而坦然。我在思考，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有时甚至是无望地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山西的一位老编剧，直到60岁时才有一个剧本被搬上舞台，但到临调演之前又被撤了下来，他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生存。从建国直到今天，我们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无论你干的再多，或者干的很少，依然一样拿工资。再往前讲，如果只是为了生存，曹雪芹就没有必要忍受着饥寒去写《红楼

梦》，他可以去卖文，市场一定很好。

也不是为了留名。没留下名字的很难留下名字，已经留下名字的仍在拼命地写。

我为什么写作？这很让我迷茫。似乎什么都为，似乎什么都不为。

1984年11月，我挂职副乡长到南岭乡体验生活，回到了我那丰厚而又无望的家乡。家乡给了我一切，但家乡却是一个贫困而又偏僻的山乡。那层层叠叠的群山峻岭、深谷河沟千百年来紧紧地箍着它，似乎没人能改变它。

1995年，阎小邦被调到南岭乡当乡长，一年后升为党委书记。这个生长在平川的铁汉子，居然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南岭乡的干部，群众，向大山、沁河宣战。他先是借铁、炼铁，随着便集资修水电战，三年修了三座水电站。紧接着便开山筑路，使南岭乡有了真正意义的路。这位务实而又闲不住的“乡官”没有讲过什么豪言壮语，却改变了我以往对干部的偏见。我们成了挚友。我把我的亲见亲闻写成了报告文学《南岭之光》。但，阎小邦没说他为什么这么干，我也没闹清他这么没命地干是为了什么。因为，面对省、市、县各级所授予他的荣誉，包括重用与提拔，阎小邦总是这样说：那都不顶甚。

更让人费解的是东四义村的党支部书记田真炉，在东田义欠外债30多万元的时候，他和村委主任杨春法上任了。15年没明没夜地干过去了，东四义的固定资产、公共积累超过了亿元，被人民日报誉为“太行山上第一村”。而田真炉和杨春法却只挣村里的“第二线工资”。县里下了“红头文件”几次催促他们搞“产权改革”，给他们俩确认一块产权，但他们都不不要。以至于被县里领导批评为“产权改革的绊脚石”。而在此前乃至以后，田真炉仍然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典范”。他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反对以写他个人为主任何形式的文章。但，他仍在一如既往地苦干。他又是为了什么？

北义城乡党委书记王宏微、东关村党总支书记贺小元不止一次地问我：他们这么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没有回答。也许他们在问自己。

我不想用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远大理想来简单地回答“我们为了什么”的问题。一则他们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而且被权威地授予“标兵”“典范”的称号；二则党风、社会风气的严重腐败，已经使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尽管它曾经是真的，也许现在仍然是真的。

赵忠祥在《动物世界》栏目中这样解说，雄性动物之间拼命地争夺对雌性动物的占有权，顽强地把自己的遗传基因保留了下来。这当然是人类对动物行为的诠释。动物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它所有的只是本能。

那么，当我们淡化了功利之后，当我们习惯了干完一件事，便马上动手干另一件事之后，我们的行为是否便成了一种本能？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么干是为了什么？”没人让我们这么做，也没人能让我们停下，包括我们自己。

青年时期的狂热和期望已变得幼稚可笑，我们不再希望一、两部作品、一、两件大事能让我们名垂青史。然而，我们却养成了一种生存和事业的本能，不攀不比，不推不让，不计较得失、荣誉，也没有终极目标。

人这一辈子，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会干点啥就干点啥。说好也随它，说赖也随它。

作者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

录

生存的本能(自序) (1)

报告文学

南岭之光

——晋城市郊区南岭乡党委书记阎小邦纪事

大旗永不倒

——全国卫生模范村东四义四十年纪

铁塔顶上的人

——高云政纪实

(88)

坚实的跑道

——北义城乡实施形象工程纪实

..... (102)

相约东篱下

——泽州县老干部局长牛麦冬小记

..... (112)

太阳的使者.....

——泽州县干部下乡扶贫纪实

..... (120)

贺小元三走“麦城”.....

——晋城市东关村30年记

..... (133)

戏曲剧本

学文音谱

余赛花..... (159)

皇帝与门官(新编历史故事剧)..... (194)

强秦悲歌(新编历史剧)..... (244)

儿女情(现代剧)..... (292)

修鞋匠的婚事(小戏曲)..... (309)

南岭之光

——晋城市郊区南岭乡党委书记阎小邦纪事

几十年过去了，南岭乡

依然没有希望，南岭人便什么也不希望了

这是个被大山、深谷、悬崖，河流严严实实地封闭了的穷乡僻壤。西临阳城县，有沁河拦道，千百年来，没有人想在河上架桥，也没有必要架桥，来往的人很少，河两岸的人一样穷的叮当响，自然没有什么物质可交流；北接李寨乡，数里长的百丈悬崖一字排开，别说人见了愁，连老鹰见了也愁；南望土河乡，十几里长的万丈深谷阴森可怕，每隔三、五年或十数八年，总有摔死人的消息在这个穷乡传递，令人不寒而栗；惟一的通道只有东面的那条被当地称作“晴天洋(扬)灰路，雨天水泥路”的盘山公路，它爬上十数里长的群山峻岭，又栽进十数里长的沟川河道，东行三十多里才可进入太洛公路。

不知南岭人的祖先为什么选中了这么块封闭、贫瘠的土地生息，繁衍。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儿更显得荒凉、空寂。

南岭人有过不少希望和幻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当时的中共晋沁县委就设在这个敌人不容易来到的地方，南岭人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跟着共产党打日寇、驱蒋匪，饿着肚子纳军粮；解放江南时，南岭一次被派出了一百五十

名优秀子弟南下，开辟南方工作。那时候的南岭人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南岭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狂喜之后，又回到了历史赋予的贫困交加之中。

“三面红旗”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南岭人又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公社化走在全县前列。他们相信共产党，认为那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生活为期不远了。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一下子把他们从社会主义的狂想之中推回到民国三十三年……

“文革”十年，南岭人饿着肚子参加了。当他们批臭了资本主义，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以后，才发现剩给自己的只是更加贫穷。每人每天八两粗粮，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可见到，经常断粮、断盐的，哪个村也数得来十几户。

南岭人有些纳闷儿，这闹腾了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反倒越来越没影儿了。一些阶级观念模糊的老贫农在背地里嘀咕：“这还不如旧社会呢。旧社会给地主打长工，还能吃上一寸厚的白面饼子。遇上灾荒年，借粮也有个地方。现在倒好，大伙一起饿肚子吧。”

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也在背后议论，“咱这‘根据地’是越来越穷了，八路军把咱们这儿忘了呀！”

直到一九八一年，国家把高压线架到了南岭，沿线的五个村通了电，南岭乡才有了点社会主义味道。没通电的二十几个村羡慕那五个通电的村，通电的村的人却冷冷地说：“通了个电，欠了一屁股债，我们是‘讨乞看烟火，肚饥眼红火’。”

南岭乡历任父母官也有过一些致富的实践，他们买了几台拖拉机，建起了农机站。

他们贷了几十万元款，开了一个煤矿，建了一个水果加工厂。

随后，又买过三部汽车，成立了汽车队。

乡供销社还搞了座小炼铁炉。

这些致富措施开始也确实让不少人心情振奋。但是过了不久便全部赔了进去。没有技术,也不懂经营管理,最要命的还是那条路,该送的送不出去,该运的运不回来,光水果一项每年要烂掉三百万斤左右。

几经折腾,欠下了国家二十多万元贷款和七万多元群众的工钱,终于总结出来一条经验:南岭乡不搞工业不赔钱。这条经验,随着南岭乡的父母官的更换,一直移交着,南岭便一直沉寂着,贫困着。

贫困和饥饿伴随着南岭人跨入了一九八三年,这已是南岭解放近四十多年了,农村改革政策在这里同样产生了奇效,南岭人基本解决了温饱。用他们的话来说:“毛主席让我们翻了身,邓小平让我们吃饱了饭。”

还有什么希望呢?希望太多了:希望点上电灯;希望有水吃;希望有一条好公路能把水果运出去,卖成钱;百把个光棍希望娶上媳妇。都是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但他们得不到。南岭没有工业,也就没有钱。没有钱,也就没有一切。他们没有能力改变那些封闭着他们的大山、深谷、悬崖、河流,没有能让人看上眼的自然资源和特产。当他们闹清了共产主义还非常遥远,闹不清社会主义到底是个啥样子的时候,便再也不去想它们了,所有的希望也都跟着破灭了。

一九八五年底,一位从来没有见过大山的人前来主宰大山。南岭人开始称他为“吹牛乡长”,后来又称他是“包工队长”,他的名字叫阎小邦。

天阴得很重,麦麸似的雪花稀稀疏疏地飞扬。正在改建中的太

洛公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连在一起缓缓蠕动着，像一条铁灰色的巨龙，汽车扬起的灰尘浓密的几乎让人看不清路面。

一辆破旧的蓝色“雁牌”工具车夹在车流中，吃力地向山顶爬去。阎小邦坐在工具车里，沉思着什么，眉头上打了两个结，两片薄薄的嘴唇紧抿着，使得那本来就消瘦的脸庞显的更加消瘦。

十天前，他的人生旅途突然拐了个大弯儿，从一个富得流油的巴公镇调到了连水都喝不上的南岭乡。虽然名义上他由副书记提升为乡长，但谁也清楚这种提拔的意味。不少人为他抱不平，纷纷劝他辞掉这份苦差事。阎小邦只是长叹了一声：“唉！去就去吧。”他没法不去，区委书记范堆相那近乎恳求的谈话，使他无法推卸这个职务。

晋城刚实行县改市体制，郊区成立也不过几个月。范堆相刚从中央党校毕业就被派到这儿任区委书记。这是个学者型干部，性格深沉稳健得像座大山，对同事、部下热情得像一团火，说话办事简练、果断。上任几个月，便把一个受体制改革波及的人心动荡的近五十万人口的郊区搞得有条不紊。他像一节火车头，经过短暂的修整后，带着整个列车平稳、有力地驶出车站。

阎小邦和区委书记只不过见过一面，谈了三、五句话。但他从整个郊区的工作效果和干部、群众的议论中了解，认识了这位书记。他打心眼里敬重他，认为他是晋城历任县（区）委书记中最杰出的之一。区委书记今天请他到家里去，到底有什么事，阎小邦心里空荡荡的。他跨进了区委书记院里，屋内静悄悄的，掀开门帘一看，范堆相正在看书。阎小邦感到意外，全区“一把手”的家里，会有这样悠静的夜晚？莫非真像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担子不够挑，晚上没人找，堆相出点子，下边没命跑。”

范堆相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阎小邦。当他详细地询问了阎小邦的家庭情况以后，便以恳求的语调说：“小邦呀，我有件事想求你，

只是不好开口呀！”

“求我？”阎小邦心里圪噔了一下。“范书记，你怎么这么客气。”

“不，不是客气，是要委屈你了。我想让你当我的‘父母官’。”

“当你的‘父母官’？”

“是呀！我是南岭人，现在又在郊区当书记。南岭太穷了，解放四十年了，多数村还没有通电，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缺水吃，交通闭塞，自然资源贫乏，基本上没有工业。群众的生活苦得很哪！然而，更可怕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保守和落后，他们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叫作不搞工业不赔钱。唉！他们丧失了富起来的希望啊。”范堆相感慨地长叹了一声，眉头锁了起来，他为自己的家乡感到焦虑。

阎小邦轻轻地笑了一声。“嘿嘿，这个经验倒是挺新鲜的。”

“不过，想在那儿搞工业的确是很难的呀！没有一个强手是搞不成的。为了选这个将，我可是费了些功夫才访到了你呀！”

“我……”阎小邦明白了区委书记的意图。

“嗯。你在村当支书的时候，带着人八年打了二十七个大井筒，才找到了理想的采煤区，你们村也因此富起来了。八年，二十七个大井筒，这没有非凡的勇气和毅力是不可能的。”

“那时我才二十岁，正血气方刚呢。”

“你在川底公社当副主任的那几年里，开煤矿，建高炉，亲自设计，领工修建高灌站，连省、市的专家都佩服你呢！”

“没有驴只能用牛，那是摸索着干的。”

“去年你调到巴公镇当副书记，几个月便建成了‘宝丰’铁厂，半年拿回了三十万元利润。小邦，你的出手可真快呀！要不是许多人都这样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范书记，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啦。我知道你意思。可我……”

“小邦呀，”范堆相急忙堵住了阎小邦的话头：“我今天请你来，是带着点放大了的私心杂念的。人吗，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建设的

好一点。再说，南岭是一个老区，是为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和牺牲的。现在，咱们能看着那儿的人受穷不管吗？”

“这……”阎小邦一下子找不到理由推托区委书记的要求，但他确实不想去南岭。前几天他在太行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说的就是南岭乡。既然野生动物在那里乐起来了，人还怎么乐呀。再说，他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和病弱的妻子需要他照顾，还种着几亩责任田，这些事他不干谁干。他属于那种“出门是干部，回家是农民”的人。要是调到南岭那个深山沟里，离家百把里，无疑要增加不少困难。还有“宝丰”铁厂那两个 20 立方米的铁炉，别看是两个铁疙瘩，没有精心管理也会搞坏的。他留恋“宝丰”，舍不得离开它。

“小邦呀，咱们搞个君子协定怎么样？”范堆相下决心要把阎小邦逼上梁山，“你到南岭工作上一年多时间，把那里的工业抓起来，关键是开个好头，打破他们那条‘不搞工业不赔钱’的经验，我就把你调回来。怎么样？”

“一年？”阎小邦有点动心啦。

“嗯，一年来地吧。”范堆相说这句话时打了点马虎，大概他也觉得一年时间太短了，所以又加“来地”两个字。紧接着他又加重了语调紧逼了一步。“小邦呀，你今天既要看我这僧面，又要看南岭老区人民的佛面哟！”

阎小邦不愿意让区委书记再用这种恳求的语调和自己谈话。此刻，他已完全理解了范堆相那颗对家乡的拳拳之心。便干脆利索地说：“范书记，别说了，我去！”

工具车猛地颠簸了一下，刹住了。雪下大了，地下白花花的。“乡长，等不等通信员？”司机问。“等！要不他怎么回去呀！”阎小邦说。十分钟过去啦，通讯员没有来。车上的几个人不耐烦啦。“这

个家伙不在这儿等车，跑哪去了。怎么能让乡长等通讯员呢？”

阎小邦没有吭声。他跳下车去，急躁的在雪地上来回踱步。
一辆喷着南岭乡标志的四轮车驶过。不一会儿，司机跑着返了回来。他走到工具车跟前，用劲在脸上挤出笑容，向车上的人恳求说：“师傅们，请帮个忙吧。路滑，四轮车上不去，请帮我推一下吧。”
车上的人谁也没吭气。让坐小车的人去推四轮车，这个人真没眼色。阎小邦刚好踱步过去，他冲着车子里的人喊了一声：“走！帮他推一下车。”说完，就带头走了。其它的人只好下了车，跟着向坡上走去。不知谁轻轻地嘟哝了一声：“真是个闲不住！”

前面百米处有个五米多长的陡坡，晴天都不容易上去，一下雪就更困难了。阎小邦带着几个干部费了好大的劲，溅了满身的泥雪，才把四轮车推上坡去。司机千谢恩，万谢恩地开着车走了。

通讯员还没有回来，司机张师傅犯愁了，“阎乡长，你刚来，不知道这路多难走，要是雪下厚啦，咱们可就全部回不去了呀！”

阎小邦没吭声。他抬起头，望了望眼前的那座浮头山。风雪中的浮头山，显的更加突兀、灰冷，仿佛要向这儿压过来似的。就是这座浮头山，挡住了南岭的东大门，封闭了南岭千百年。“终有一天，老子要把你劈开！”阎小邦心里恨恨地想。

十几分钟过去了，雪下的更大了，车上的人焦急起来。这时，从陡坡上跑下来一个人，还是那个四轮车司机。

“师傅们，再帮我推推车吧。要是大雪封了山，我那四轮就要扔在山里过冬了。那是我的全部家当呀，求求你们啦！”司机恳求着，掏出“大光”烟递进车里去。

没有人接他的烟。

张师傅悄悄地提醒了他一句：“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足呀！你知道刚才帮你推车的那个人是谁？”

“是谁？”

“咱们新来的阎乡长。”

“啊！就是那个‘吹牛乡长’？”四轮车司机冒冒失失地喊出声来。

“‘吹牛乡长’！”阎小邦心里紧了一下，脸色刷地变了。他平时最恨那些吹大话不办实事的人，就在他上任的这十天里，他已从外地借了一百吨生铁，卖了五万元钱，作为冶炼厂的建设资金。这两天已经在动工修炉子啦。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费心尽力苦干，换来的却是顶‘吹牛乡长’的桂冠。

“你说什么？”阎小邦铁青着脸问四轮车司机。“不，不是我说的！是听别人说的。听说你要在年前建两个冶炼厂，群众都不相信。说你是在‘吹牛’。”司机满脸懊悔，急忙分辩着。

“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我们这搞过几个小高炉，全都赔了血本。这浮头山挡着南岭的财气，该进来的进不来，该出去的出不去。反正，南岭不搞工业不赔钱。”

“又是这个狗屁不通的经验在作怪！”阎小邦心里沉甸甸的。

“你们在，我走啦！”司机不敢再指望车上的人帮他推车啦。

“你回来！”阎小邦叫住了司机。“咱们俩换工，我帮你推车，你替我给群众捎两句话。我阎小邦要是在年前建不成两个冶炼厂，就自动卷铺盖滚蛋，行不行？”

“这……怎么敢再麻烦你这乡长呢？”司机面有难色。

“这有什么？我当干部以前也和你一样，是个穷百姓。”

“行，行！”司机乐得一颠一颠的，乡长为自己推车，而且推了两次，这是他做梦也没敢想的事。

当阎小邦带着人把四轮车推上浮头山返回来以后，通讯员也赶来了。这回该他们推着自己的车上浮头山啦。